

#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城乡比较研究

——厦门市个案研究

张友琴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data of social survey held in urban and rural Xiamen from 1996 to 1998.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and size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for the elderly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and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etworks and daily life. It points out, 1) family support is still the main part of the elderly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2) the function of family members in the support network shows characteristic of community; 3) the situation of family support in city differs from countryside, depending on the types of sub-support networks and intervention of formal support; 4) the multiplex of social support is helpful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lderly life.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some points of view in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 policy for elderly and the indexes of measure.

##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简单回顾及本文的特点

社会网和社会支持网研究是我国社会学界近年来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网络的研究不仅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学的主流, 而且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检索近年来国内的有关文献, 大致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类: 1. 以研究目的为标准, 分为介绍或评价社会网和社会支持网的理论、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开展各种实证研究和理论检验两类; 2. 以研究类型为标准又可分为两类: 一是专题研究, 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不同的群体, 如: 求职过程(边燕杰, 1999)、城市家庭(徐安琪, 1995; 潘允康、阮丹青, 1995)、流动民工(李培林, 1996)、下岗工人(丘海雄等, 1998)、职业妇女(Angelina, 1997)、老年人(刘爱玉、杨善华, 2000)、城市贫困家庭(唐钧、朱耀垠、任振兴, 1999)等; 二是比较研究, 有国内跨社区的研究, 如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的比较研究(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 1997; 张文宏、阮丹青, 1999), 也有跨文化的与国外社区比较研究, 如北京与英国利物浦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 1998)、天津与美国居民社会网的比较研究(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 1990)等。这些实证研究, 不仅丰富了我国社会网及社会支持网的理论, 而且从不同角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运用的可行性进行了检验, 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走向世界, 开展国际间的学术对话奠定了基础。

追寻社会网研究的发展轨迹, 可见两大方向, 一是社会计量学的定量研究; 二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研究(肖鸿, 1999: 1)。社会支持网研究的发展也受到不同研究角度的影响, 有的较注重对支持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研究支持网的结构和模式(Garbarino, 1983: 4)。社会网和社会

支持研究同是网络分析,在实际研究中,二者时常被连在一起使用,社会网络时常扮演着支持的角色(阮曾媛琪,1996),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特征是强调按照行为的结构限制而不是行动者的内在驱动力来解释行为。但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社会网并不时常是支持网络,社会支持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社会网中的子集合,是那些在个人之外的情感援助、工具性援助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帮助,而在结构主义看来,社会网仅仅是一种关系,这些关系并不是在有的时候都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也可以说,社会网的基本兴趣是研究网络的结构而不是考察网络支持的功能(Angelina, 1997: 8)。

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开展社会支持网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社会转型与变迁,使得社会成员中的压力群体和弱势群体增加。当人们遇到问题时,他们会向谁寻求帮助呢?国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大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更倾向于向非正式的网络求助,如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甚至熟人等(Gottlieb, 1980)。那么,这种倾向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群体中是否有差异?

在相关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蔡禾等人指出,人们在寻求支持时,实际上是受到了社区性质和社会成员自身特征的影响,生活在城乡不同社区的人对血缘和业缘关系的选择是不同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从业缘关系中寻求支持,而农村居民则更倾向于血缘的关系(蔡禾等,1997: 9);在北京与英国利物浦老年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中,作者比较了老年社会支持网的5种类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成员互动的差异,认为尽管两地存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但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类型的分布仍有很多相似之处(珂莱尔·婉格等,1998: 56);而在对天津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中,作者从文化和结构两方面解释了亲属关系(包括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等)和同事、朋友、邻居等非亲属关系在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种网络中的不同作用,认为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并未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显著降低,家庭关系的重要性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具性支持领域中表现尤其显著(张文宏、阮丹青,1999: 20)。

从总体上说,目前中国在社会支持网研究方面对老年人的关注还很不够。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当前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还不充足的情况下,研究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问题更具有现实的意义。老年人退出社会劳动领域后,也相应地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社会角色而成为弱势群体。因此,了解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状况,探索重构社会支持网络的途径,对于老年人个人安度晚年、提高生活质量,对于社会平稳渡过人口老龄化危机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社会支持的角度出发,试图从实证、定量的角度探讨社会支持网的有关理论问题,关注的重点是:1. 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结构性差异和网络规模差异,研究内容集中在影响老年人生活的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即经济保障、生活照顾、精神慰藉;2. 探讨网络测量指标的改进;3. 通过分析社会支持的网络规模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探索社会支持网的功能,体现社会学研究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本文是以1996—1998年间对厦门市城区和农村老年人生活与供养状况的两次大型抽样调查<sup>①</sup>的数据资料为依据,首次在时间相近(城乡调查前后相距仅一年),且同地区(厦门市)、同一文化背景(闽南文化)下研究生活在不同社区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较好地克服了因时、

<sup>①</sup> 在两次调查中,笔者任调查组长,张时飞任副组长,厦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94、95级部分同学参与了调查,在此谨表谢意。

因地、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理解上的误差,使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假设

本文所依据的调查始于1996年10月,结束于1998年5月,分城区和农村两次进行。城区调查的地点为厦门市岛内4个区,农村的调查地点为岛外2区1县(当时厦门市有6区1县)。

(一)抽样方法。调查采取阶段随机抽样和入户问卷访谈的方式,以1994年厦门市老龄委对60岁以上老年人的普查数字为抽样的依据,在每个区(县)中随机抽出若干街道或乡、镇,再从抽中的街道或乡、镇中随机抽出若干居委会或村,在这些居委会或村中按居(村)民花名册,随机等比例地抽出规定数量的样本。

城区样本:厦门市岛内是城市的中心区,也是特区的所在地。1996年岛内共有4个区、12个街道办事处。我们在4个区中先随机抽出7个街道,再从这些街道中随机抽取28个居委会,然后根据该街道老年人总体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分别在各个居委会的居民花名册上随机等比例地抽取规定的样本。城区共获得有效样本1006个。

农村样本:1996年厦门市岛外共有2区1县(同安县)、2个街道办事处、23个乡镇,其中同安县有16个乡镇。为了准确反映同安县农村的状况,我们把同安县的乡镇按其经济状况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中等地区、贫困地区,并在这三类地区分别选取了新民、五显、汀溪三个乡镇,从集美和杏林区分别选取灌口镇和杏林镇(因考虑交通和经费问题,农村乡镇的选取未按随机原则进行),再从这些乡镇中随机抽取12个村委会,然后根据该乡镇老年人总体的年龄和性别特征分别在各个村委会的居民花名册上随机等比例地抽取规定的样本。农村共获得有效样本1016个。

由于抽样前考虑了老年人的总体分布情况,因此样本与总体的配合较好。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二)问卷设计。为了保证调查结果的可比性,两次调查采用了基本相同的问卷。问卷设计参考了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课题“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并增加了部分项目。全部问卷共分4大部分:老年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经济收支状况、社会联系与社会活动、心理状态;城区问卷共有301个变量,农村问卷222个变量。问卷中与社会支持网有关的主要问题涉及:老年人与家人同居的状况、老年人接受经济支持的来源及网络关系数量、老年人生活的主要照顾者及期望、老年人平时倾诉心事的对象、老年人对生活和经济状况的满意度等。

由于这两次调查不是关于社会支持网的专题调查,同时考虑到老年人这一角色在摄取资源过程中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从网络分析的角度研究老年人支持网的构成、规模等,而不研究老年人获得支持的动机和过程。

由于这两次调查不是关于社会支持网的专题调查,同时考虑到老年人这一角色在摄取资源过程中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从网络分析的角度研究老年人支持网的构成、规模等,而不研究老年人获得支持的动机和过程。

(三)测量指标。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和测量指标:1. 社会支持网,指老年人从社会和他

项目	样本与总体状况的对比 (%)		
	总体 N= 119227	城市 n= 1006	农村 n= 1016
性别: 男	43.0	44.3	44.0
女	57.0	55.7	56.0
年龄: 60—69岁	63.2	58.9	61.6
70—79岁	27.5	30.9	29.4
80—89岁	8.5	8.9	8.1
90岁以上	0.8	1.3	0.9

人处获得的各种支持的总称,具体分为三个子支持网,即经济支持网、生活支持网、精神支持网;2. 经济支持网,是指老年人从外部(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关系)获得的各种经济帮助的结构状况;3. 生活支持网,是指老年人从外部获得的各种生活照顾与支持的状况;4. 精神支持网,是指老年人向其倾诉心事的对象的结构状况;5. 网络规模,是指构成老年人支持网中各种关系的数量;6. 零关系,指不存在任何社会关系。

本文使用的网络规模概念与社会支持网研究中常用的规模概念不同,它关注的是构成老年人个人支持网的关系数量而不是提供支持的成员数量。作为研究网络规模的经典范式之一,范德普尔在1987年对荷兰进行全国性的初级关系和社会支持调查时使用了提名的方法。研究者对支持网规模的关注点是被调查者提出的前10名个人,并由此研究这10个人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以此测量某种关系的重要程度。这一方法无疑有其合理性,其标准问卷已被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调查所使用,我国许多社会支持网的研究者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肖鸿,1999:7),所不同的是减少了网络成员提名的数量(张文宏、阮丹青,1999:14)。但笔者认为,在本文所涉及的研究中使用这种方法有其局限性。第一,本项研究的目的是测量支持网网络关系的强弱,而是比较城乡支持网的构成、一般规模以及这种网络状态与老年人生活的关系。对于个人的社会支持网而言,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要大于个别成员。从范德普尔提名法的最终目的来说,实际上也是要通过提名追溯到关系。因此,如果用提名的方法有舍近求远之累。第二,从操作上说,关注关系要比关注人名更让人一目了然,更便于操作。至少在中国,一些研究已证实,被调查者往往对关系更感兴趣,甚至把关系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张其仔,1999:27)。第三,关系与个人在量上通常不是对等的,一种关系有时包含了一组成员,比如朋友、同事、邻居等关系,这一关系对个人是否起支持作用往往是因人因事而异,要求每个被调查者逐一提出名字,不仅费时、费劲,而且难以顾及支持的具体内容。我们使用的二项分布的问卷设计,列出与支持有关的各种重要关系,就能够通过计算某种关系的比重做出对支持状况的整体判断。因此,用关系数量作为测量网络规模的指标是可行的,也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

本文的研究假设是:1.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因子支持网类型和制度介入的不同而显出城乡社区的差异;2. 网络规模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率有关系。

### 三、研究结果

#### (一)老年人社会支持网构成的城乡比较

##### 1. 经济支持网构成的城乡比较(见表2)

从表2可见,城乡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存在较大差别。虽然城市中有65.8%的老年人可以或正在享受离退体的保障,但通过对支持网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实际上是一个多样性的混合结构,其中以制度性的正式经济支持为主,占全部经济支持的31.9%,子女的经济支持占27.9%。此外,老年人还有其他经济支持,但这些支持主要来自老年人自身的储蓄和房屋的租金收入,这两部分收入可视为老年人的自助部分,而自助部分是不应列为社会支持的。因此,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基本上是一个以制度性的正式支持(社会保障)为主体、子女支持为辅的混合型网络。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是进行支持网络的结构分析,而不涉及支持的强度,即支持金额的多少。

表 2

经济支持网的城乡比较

(%)

支持的来源	城区		农村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家庭: 子女	57.6	27.9	79.6	61.0
亲属	9.7	4.7	8.4	6.4
国家: 离、退休金	65.8*	31.9	—	—
救济等资助	4.1	2.0	5.8	4.4
居(村)委会资助	12.0	5.8	23.5	18.0
其他	49.0	27.8	13.3	10.1

说明: 1. 项目栏中的“提到的比例”是指被调查的老年人提到的提供帮助人员的次数占回答人数的比例(以下同)。

2. \* 的数据包含了个别享有退休金而当时尚未退休的人员。

与城市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中没有离退休金这一部分,制度性的正式支持所占比重极小(4.4%),家庭成为主要的支持来源,其中子女的支持比例大大高于城区,亲属帮助的比重也比城市高,两项相加,农村老年人从家庭(族)获得的支持比重达 67.4%,是城市老年人的一倍。此外,村集体对老年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占 18.0%。其他的经济支持所占比重较城市小得多。当然老年人的自助部分也不可忽视。可见,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网是一个以家庭支持为主体、村集体支持为辅的混合型网络。

## 2. 生活支持网构成的城乡比较(见表 3)

表 3

生活支持网的城乡比较

(%)

支持的来源	城区		农村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家庭成员: 配偶	40.0	42.8	7.1	30.1
儿子	13.5	14.3	4.7	20.1
女儿	10.3	11.0	2.1	8.8
儿媳	22.4	23.7	7.3	31.5
女婿	1.6	1.7	0.7	2.9
其他亲属	1.3	1.3	0.3	1.3
保姆	3.9	4.1	—	—
朋友、邻居			0.4	1.7
居(村)委会干部	1.0	1.0	1.0	3.4
其他				

说明: \*城区问卷对于老年人生活照顾的调查内容较多,涉及吃饭、穿衣、洗澡、上厕所、做饭、洗衣、做家务、购物等方面。由于调查中生活能自理、部分自理的老年人占调查总数的 99% 以上,故前 4 项中需要他人帮助的老年人数极少,表中显示的是经过整理的后 4 项内容的综合平均数据,以便与农村的数据比较。

与经济支持网不同,农村老年人从外部获得生活帮助的比重极低,与城区老年人相比,其独立性也更高。从表 3 数据中可看到在城乡老年人的生活照顾者方面的异同。第一,城区老年配偶的支持率高于农村。城区老年人的第一生活照顾者是配偶,即使考虑丧偶率因素,城区老年人配偶的作用也要大于农村。城乡老年人在夫妻关系上的差异性在精神支持网中还可以得到证实。第二,儿媳在老年人生活照顾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农村儿媳对老年人的支持率要高于城区。第三,目前城乡老年人生活照顾的主要支持来源还是家庭,但儿女的帮助在城乡也有很大差异。城区中女儿的帮助大于农村,而农村中儿子的帮助比例高于城区。此外,农村老年人从家庭之外获得的帮助主要来自村委会和邻里,而城区老年人则主要靠保姆。从总体来说,家庭对城区老年人的支持高于农村,虽然家庭成员对城乡老年人帮助的比例几乎没有城乡

差别(城区 93.5%, 农村 93.4%), 但如果注意老年人提到某一具体关系的比例时, 则家庭成员提供给农村老年人的帮助的比例便大大低于城区。

那么, 这种状况与老年人的选择是否一致? 数据表明, 当询问老年人在生活上“希望由谁来帮助您”时, 城乡老年人回答的结果是惊人的一致, 即家人, 所不同的仅仅是对象的排列顺序而已(城区为: 配偶、儿子、儿媳; 农村为: 儿子、配偶、儿媳)。其他所列的支持均不在考虑之列。

### 3. 精神支持网构成的城乡比较

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调查数据显示, 城区中 10.5% 的老年人有孤独感, 而在农村这一比例更高, 达 20.0%。但城乡的老年人在“有可诉说的对象”上所占的比例却十分接近, 分别为城区 68.7%, 农村 67.2%。因此, 分析精神支持网的构成就很有意义了。表 4 的数据显示了城乡老年人精神支持网构成上的差异。

表 4 精神支持网的城乡比较 (%)

可诉说的对象	城区		农村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提到的比例	平均比重
家庭成员: 配偶	41.8	23.7	36.8	19.9
儿子	34.1	19.4	42.4	22.9
女儿	27.9	15.8	32.2	17.4
儿媳	18.3	10.4	25.0	13.5
女婿	4.9	2.8	15.9	8.6
其他亲属	10.0	5.7	8.2	4.4
朋友、老同事、邻居	20.5	14.0	22.0	11.9
居(村)委会干部	8.5	4.8	1.7	0.9
其他	0.3-2.7	3.3	1.0	0.5

首先, 城乡老年人在倾诉心事的对象上不同。在城区, 把配偶作为倾诉对象的比例最高; 而在农村, 老年人的主要倾诉对象是儿子。农村老年人以儿媳、女儿为倾诉对象的比例也高于城区。可见, 城区老年人更多地向配偶诉说心事, 而农村老年人则更多地找子女诉说心事。

其次, 农村老年人在精神上对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区。在城区, 老年人把家庭主要成员作为倾诉对象的比例为 72.1%; 而在农村, 这一比例则达 82.3%。

第三, 城区老年人在家庭成员以外可倾诉心事的各种对象的比重均高于农村老年人, 比如, 城区老年人向朋友、老同事、邻居、居委会干部诉说心事的比重都高于农村老年人。

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家庭对老年人精神支持的作用大于非家庭成员, 而农村老年人在精神慰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依赖程度要高于城区的老年人。

#### (二) 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城乡比较

如前所述, 本文对网络规模的定义是指向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关系的数量。因此, 网络的平均规模就是老年人个人所拥有的各种关系的平均数量。了解网络规模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支持网的结构差异。城乡老年人个人所拥有的关系数量在不同的子支持网中有很大的差异。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家庭支持在老年人支持网中的地位, 表 5 增加了“一起生活的家人”一项, 指与老年人一起生活的家人的关系数量; 同时, 在生活支持和精神支持网中专设了家庭成员的支持一项。

表 5

城乡网络规模比较

比较项目	城区			农村		
	平均规模	标准差	零关系(%)	平均规模	标准差	零关系(%)
一起生活的家人	2.006	1.052	7.6	1.482	1.057	19.0
生活照料	1.707	0.884	0.7	0.235	0.672	85.4
由家人照料	1.645	0.894	3.4	0.219	0.616	85.5
可诉说心事的对象	2.104	1.606	14.7	1.852	1.904	32.2
可诉说心事的家人	1.211	1.291	38.4	1.524	1.614	37.4
经济支持	1.341	0.994	19.7	1.306	0.732	10.1

表 5 数据显示,除经济支持网规模城乡大体相当外,从总体上说,城区老年人的支持网平均规模要大于农村老年人。与城区老年人一起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关系平均有两种,而在农村则不到 1.5 种。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各个子支持网中平均规模最大的是精神支持网(城区 2.10,农村 1.85),这点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农村都一样,但农村家庭支持的平均规模却大于城区。虽然两个社区中在家庭成员精神支持方面关系为零的老年人比例相当(城区 38.4,农村 37.4),但城区老年人通过向家庭之外寻求精神慰藉后,使零关系下降为 14.7,而农村老年人则缺少家庭之外的支持。

其次,在生活支持网中,城区老年人的网络平均规模大大高于农村老年人,在家庭成员关系为零的老年人中,通过非家庭关系的帮助可使零关系比例下降 2.7 个百分点;而农村的老年人不具备这个条件,85.5%的老年人没有任何家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即使寻求家庭之外的帮助,零关系下降的比例仅有 0.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照顾方面的零关系比重相当大,换句话说,可以认为绝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上是靠自己。

对于网络规模的研究还可以从它在三个子支持网中的分布状况来考察(见表 6)。数据显示,从共同生活的家庭关系来看,城区老年人的家庭关系要比农村复杂,传统意义上对农村家庭关系的解释受到了挑战。其次,城区老年人在生活照顾方面获得支持的状况远比农村老年人强;而在精神支持方面,虽然农村中 6 种以上关系的比例高于城区,但 1—5 种关系的比例却低于城区约 19 个百分点。所以,从总体上说,城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的异质性程度较高,比农村多元,网络规模也较大。

表 6

子支持网中支持关系数量分布的城乡比较

(%)

网络规模	与家人生活		生活照顾		家人照顾		诉说对象		家人为对象		经济支持	
	城区	农村	城区	农村	城区	农村	城区	农村	城区	农村	城区	农村
零关系	7.6	19.0	0.7	85.4	3.4	85.5	14.7	32.2	38.4	37.4	19.7	10.1
一种关系	23.1	34.4	48.6	8.4	48.1	9.0	27.9	21.3	28.0	21.6	40.7	54.8
二种关系	38.2	29.4	35.5	4.6	34.2	4.5	22.5	15.9	16.2	15.9	28.7	29.6
三种关系	24.1	13.7	10.6	0.9	9.8	0.4	16.1	10.7	11.2	9.4	8.2	5.1
四种关系	6.0	3.3	4.0	0.4	4.0	0.3	9.3	7.6	4.1	7.9	2.0	0.3
五种关系	1.0	0.1	0.4	0.1	0.4	0.3	6.3	6.8	2.2	7.9	0.7	—
六种关系	—	—	0.1	0.2	0.1	—	2.3	3.4	—	—	—	—
七种关系	—	—	—	—	—	—	0.9	1.6	—	—	—	—
八种关系	—	—	0.1	—	—	—	0.1	0.5	—	—	—	—

### (三)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率的城乡比较

研究城乡社会支持网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探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途径及相关政策,测量社会支持网的网络规模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程度的关系,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社会支持网的功能。调查数据显示,城区老年人对其生活的满意率高于农村,其中对日常生活感到满意的 比例为 87.4%,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为 84.7%,对经济状况感到满意的 比例为 80.4%;而农村 分别为 75.3%、80.6%、63.7%。城乡老年人在生活满意率上的差异是否与其社会支持网的 规模有关系?表 7 是运用相关比率方法计算老年人在不同网络规模状态下(自变量)与其生活 满意程度(因变量)的关系。

表 7 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率的相关系数(Eta)

支持项目(自变量)	因变量	城区	农村
一起生活的家人	日常生活满意状况	0.106	0.166
生活照顾	日常生活满意状况	0.141	0.142
由家人照顾	日常生活满意状况	0.132	0.143
一起生活的家人	是否有孤独感	0.132	0.201
诉说对象	是否有孤独感	0.054	0.175
以家人为诉说对象	是否有孤独感	0.032	0.180
经济支持	经济生活满意状况	0.214	0.086

数据显示,从总体上说,网络规模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程度有关,在生活支持和精神慰藉 两方面,所设自变量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状况的解释力要强于城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家庭关系状况对于农村老年人生活的满意率有更强的解释力。比如,同老年人一起生活的 家庭成员的关系数量与老年人日常生活满意状况的关系农村(0.166)比城区(0.106)高;而在 精神慰藉方面,精神支持网的各项规模指标与农村老年人是否有孤独感的关系也大大强于城 区。换言之,精神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关系比城区老年人;而经济支持网与城区 老年人经济生活的关系要远比农村强。

#### 四、结论和政策关注

通过以上数据的分析与比较,基本上验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由此可以就老年人社会支 持网的城乡社区比较做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家庭支持是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基础,也是其社会支持网的主体

个人的社会支持来源于两个基本渠道,一是正式的制度化支持;二是非正式的非制度化 支持。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而言,前者的支持主要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社区正式组织的帮助 等,后者的支持主要来自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同龄群和老同事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老 年人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非正式的支持网络,而家庭支持又几乎成为非正式支持的全部。数 据从静态的角度展示了家庭支持在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城乡老年人社 会支持的基础,也是其社会支持网的主体。家庭支持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在所有社会支持中 占的比重,同时也体现在老年人的个人选择之中。

既然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主体,那么探讨其网络机制就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家 庭支持的认识。信任是网络的机制,它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可以降低人们经济行为的交易



成本。这种对网络机制的一般性解释,适用于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网。比如,老年人对家庭的信任,可以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同时也可以降低获得支持的成本。但是,老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机制有特殊性。笔者认为,对于老年人来说,情感在个人选择中占有更重的份量,情感在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内在机制,它深深地嵌在家庭支持网络之中,对老年人的选择起引导的作用,是解释亲属支持作用强于非亲属支持的重要理由。情感与信任都是一种心理状态,但情感若以血缘和婚姻为基础,就比信任更深层,对个人行为具有更强的引动性。在家庭支持网中,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机制不仅仅是信任,更重要的是那种建立在血缘和婚姻基础之上的无法割舍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存在于老年人一方,也存在于配偶、子女一方;一旦情感不存,家庭的支持也就难以继续。

## (二)家庭成员在支持网中的作用有社区差别

配偶、子女和儿媳妇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本研究发现,在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中,这些家庭成员的作用具有较明显的城乡社区差别:

第一,配偶对于城区老年人的支持大于农村老年人。在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持网中,城区老年人配偶支持的比例高于农村。换言之,城市老年人在寻找生活照料和倾诉心事的支持中,更倾向于自己的配偶。这可能是因为城市老年人的夫妻关系比农村老年人的夫妇关系更密切、更平等。

第二,儿子对农村老年人的支持在不同的子支持网中所占的比例均高于城区,在精神支持方面甚至高于配偶,这说明农村老年人比城区老年人更趋于向儿子寻求支持。

第三,女儿在生活照顾方面对城区老年人的支持高于农村老年人,而在精神慰藉方面的支持则低于农村老年人。

第四,儿媳妇对农村老年人生活和精神方面的帮助高于城区。

在家庭支持中,女性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支持者,这说明在家庭支持中,传统的支持方式并未消失。但如果比较子女与儿媳妇提供支持的内容,我们惊奇地发现,城乡的社区差别消失且呈现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儿媳妇在老年人生活照顾方面的支持大大高于儿子和女儿,甚至高于农村老年人的配偶,而女儿或儿子在老年人精神方面的支持均高于儿媳妇。也就是说,老年人趋于向儿媳妇寻求工具性的支持(生活照顾),而更趋于向子女寻求精神性的支持。笔者认为,这种角色差异是情感这一机制起作用的结果。毕竟对父母来说,尤其是对步入暮年的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亲子之间的那份情和爱。

## (三)家庭支持的作用因社会支持网内部子支持网的类型以及正式的制度化行为在不同社区介入程度的不同而呈现相当明显的社区差别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主要由经济支持网、生活支持网和精神支持网三个子支持网构成。由于社区的不同,家庭支持在这三个子支持网中的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别。从家庭支持占有支持的比重来看,在城区,家庭的支持占生活支持网的比重最大,精神支持网次之,经济支持网最小;在农村,家庭支持比重的大小依次为精神支持、经济支持、生活支持。从网络的平均规模来看,也呈现出同样的城乡差别。这是因为,城区老年人的经济自立状况较好,需要家庭的支持最少;在精神支持方面,由于可以获得家庭之外的支持,因而对家庭的依赖也较少;而城市老年社会服务资源的匮乏,使老年人更多地依靠家庭的支持。农村的情况则不同,农村老年人生活独立性较强,因此对家庭的依赖最少;但独居及社会活动圈子狭小,使他们在精神上更依赖子女。数据还显示,在非亲属支持中,正式的制度化的关系更倾向于提供经济支持,非

正式的关系更倾向于提供精神支持,这些支持的比重在城市均比在农村大。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农村老年人比城区老年人缺少家庭之外的支持。

正式支持是政府及其他正式组织对老年社会支持的一种制度性介入,是造成城乡支持网差别的重要原因。在城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介入不但已经获得制度性的认可,而且在实践中已显示出成效,从而成为老年人经济支持网的主体;而农村的老年人则缺乏正式的制度性支持,由于制度性支持介入有限,农村的老年人在经济上仍需依靠子女,这种选择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老年人因外部支持资源的匮乏所致的无奈。

(四)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多元化有助于改进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品质,提高生活满意率

社会的转型,促使人们的社会支持结构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一元结构向多元结构发展的过程(丘海雄等,1998:31)。社会资源理论认为,个人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从而取得理想的工具性行为的成功率也越高。本项研究的数据反映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平均规模与老年人对其生活质量的评价是有关系的。网络规模的大小直接反映出老年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数量,规模越大,说明老年人的社会支持越多元、异质性程度越高。同样,家庭关系在支持中的数量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状况也有关系。对城乡社会支持网络平均规模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老年人的支持网络规模在每一个子支持网中都高于农村老年人,结合网络规模与生活满意状况关系的指标(Eta),我们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生活在城区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率要高于农村老年人的现象。本研究在界定网络规模概念上所做的修正,增强了这一指标的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老年人在争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地位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多元化过程。

上述几点结论,同时可以引申出我们对以下三个群体的政策关注:

第一,对独居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的独居老年人的关注。调查数据显示,农村中的独居老年人(零关系)的比例高达19.0%,比城区高11.4个百分点,在生活支持网络中,农村零关系的老年人比重甚至达到85.4%。解释这一现象的答案可能有:(1)独居并不意味着支持为零,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老年人虽然不与子女共同居住,但他们与子女家庭的距离却很近,居住在同村的比例为94.1%;(2)农村中低龄老年人(60—69岁)多,而低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较强;(3)城市化的影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的家庭关系已经变化,大家庭减少,家庭关系简单化,使家庭成员在生活上对老年人的帮助相应减少;(4)农村老年人的丧偶率高于城区。

我们在结论部分已经分析了家庭支持对于农村老年人的重要作用,那么,在当前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无法在短时期内有效建立的情况下,如何建立和发展一种可以巩固和加强家庭支持的机制,就是今后老年社会政策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对高龄老人的关注。老年人在面对退休、原有的社会关系网松散后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坚持自立。但是,随着老年人的高龄化,当这种个人选择不能再继续下去时,老年人及家庭就将面临着是与成年的子女同住,还是到养老机构去的痛苦选择(Nancy Hooyman, 1983)。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向高龄化方向发展进程中必然面对的问题。如何重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建立强有力的社区支持网络系统,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助与支持,是在倡导社区照顾模式时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对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关注。我国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在近10年内将产生大量的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将面临着家庭支持网络规模下降的现实。而提供支持的子女,也将面对照顾夫妻双方老年父母的巨大压力。独生子女家庭作为

非正式支持的主要单位,其自身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因此,国家和社会能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提供多元化的支持,将成为今后制约生活在这类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瓶颈”。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1999,《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
- 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 1997,《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民寻求社会支持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珂莱尔·婉格尔、刘精明, 1998,《北京老年人社会支持网调查——兼与英国利物浦老年社会支持网对比》,《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李培林, 1996,《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刘爱玉、杨善华, 2000,《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 3 期。
- 潘允康、阮丹青, 1995,《中国城市家庭网》,《浙江学刊》第 3 期。
- 丘海雄、陈健民、任焰, 1998,《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 从一元到多元》,《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 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阮曾媛琪, 1996,《社会支持网络与社区照顾》,《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 唐钧、朱耀根、任振兴, 1999,《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
- 肖鸿, 1999,《试析当代社会网络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徐安琪, 1995,《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第 2 期。
- 张其仔, 1999,《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张文宏、阮丹青, 1999,《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社会学研究》第 3 期。
- Angelina, W. K. & Yuen-Tsang 1997, *Towards a Chinese Conception of Social Suppor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 Garbarino, J. 1983,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Rx for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In J. K. Whittaker, J. Garbarino, and Associate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ldine de Gruyter, NY.
- Gottlieb, B. 1980, “The Role of Individual and Social Support in Preventing Child Maltreatment.” In J. Garbarino, H. Stocking, and Associates *Preventing Children from Abuse and Neglec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ottlieb, B. H. & Hall, A.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Preventiv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R. H. Price, & Politser, P. E. (eds.), *Prevention in Mental Healt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oyman, N. 1983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in Services to the Elderly.” In J. K. Whittaker, J. Garbarino, and Associates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ldine de Gruyter NY.

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志敏